

清末知识分子在引进国外教育时的自主意识
——以《蒋维乔日记》为素材

班 婷（广岛大学大学院）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蒋维乔日记》中蒋维乔等人对日本教科书编写经验的吸取过程，考察了清末国内知识分子在引进国外教育时的自主意识。1904 年到 1906 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套近代国文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蒋维乔等人在编写国文科教科书之初，由于不懂近代教科书的编写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日本顾问带来的日本教科书的编写方法，然而随着蒋维乔等人编写经验的逐渐积累，他们开始考虑本国的教育实情与独特的语言文化，对日本的教科书编写经验也逐渐转变为批判性扬弃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国内知识分子在引进国外教育时的自主意识。

【关键词】《蒋维乔日记》；清末；知识分子；自主意识

一、引言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震惊于日本在短时期内迅速增长的国力，掀起了向日本学习以促进本国近代化的热潮。这一时期，中国通过派遣留学生与视察员、招聘日本人教习、翻译日文书籍等多种方式，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吸收了日本的近代化要素。尤其在教育方面，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先后模仿日本的学制制定了壬寅学制（1902）、癸卯学制（1903）、壬子癸丑学制（1912）等三个近代学制¹。可见，清末民初时期，日本的教育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²。

在清末民初时期的中日教育文化交流史方面，已经涌现了很多研究成果，尤其以田正平³、汪婉⁴、阿部洋⁵、吕顺长⁶等研究者的著作为代表。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考察了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本教育的借鉴。然而，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吸取先进教育经验时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却很少有研究触及。本文将通过对《蒋维乔日记》⁷的解读，来考察当时的国内知识分子在吸收日本教育经验之际的自主意识，即他们有没有在考虑本国教育实情的基础上对日本的教育进行批判性扬弃，又是怎样进行扬弃的。

¹本文中出现的日期一概使用农历。

²汪婉等研究者指出，日本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清末民初时期。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由向欧美学习转变为向日本学习，而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教育的模仿借鉴对象再次由日本变成了欧美。（汪婉（1998）、p372）。

³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⁴汪婉（1998）。

⁵ 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竜溪書舎 2002。

⁶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 北京 2012。

⁷蒋维乔日记已于 2014 年出版影印版（蒋维乔《蒋维乔日记》中华书局 2014），本文在使用该影印版的基础上参考了汪家熔选注版中的断句法（汪家熔（1992））。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佛学家。甲午中日战争之际，也正是蒋维乔开始接触西学之时，从此他无意科举而专心西学。1902年起学习日语，并开始翻译日本的报纸书籍，翌年受蔡元培之邀先后任教于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同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教科书编写工作。同时，他还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尚公小学兼任校长，并在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师范讲习所等一边从事教学实践工作一边编写师范教学用书。1912年受蔡元培之邀进入民国教育部任参事，参与了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与审查工作，翌年辞职回到商务印书馆。1917年受邀再次进入教育部，1922年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25年起任东南大学校长，并在多所大学任教。

蒋维乔自1896年9月至去世的60年间，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尤其是自1903年他开始编写国文教科书，到1906年《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下简称《最新国文教科书》）全部出版为止的4年份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吸收日本教育思想及经验的经过。本文将着眼于蒋维乔等人在编写《最新国文教科书》的过程中与日本顾问长尾楨太郎、小谷重的交流，考察蒋维乔等人在吸取日本教科书编写经验时的自主意识。

二、《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最新国文教科书》于1903年末开始编写，1904年到1906年间陆续出版。共十册，用于癸卯学制中所规定的五年制初等小学堂⁸。这套书是中国近代第一套国文教科书，出版后立刻风行全国。蒋维乔是这样描述其受欢迎程度的：“一、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二、在白话文教科书未提倡以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⁹可见这套书对当时的教育界影响之深。从该书封皮上的出版信息来看，其编纂者为蒋维乔与庄俞，校订者为日本顾问长尾楨太郎、小谷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及编译所国文部部长高凤谦。该书为什么会有日本人参与校订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1903年到1914年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的出版社金港堂进行了合并，金港堂派来顾问长尾楨太郎和小谷重¹⁰。长尾于1888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现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任学习院讲师，并于同年任职于文部省专门学务局。之后更是历任东京美术学校教授、第五高等学校教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等。小谷重在进入金港堂之前，也曾任职文部省图书审查官。从两人的职业经历可以看出，两人对日本的教育，尤其是教科书的编写方法应该有全面掌握。

⁸但是该教科书的内容并没有遵照癸卯学制中的中国文字科的规定。关于此点笔者将在别稿中详细论述。

⁹蒋维乔（1935）。

¹⁰有文章主张日本顾问加藤驹二也参与了教科书的校订工作（张静庐编（1597）、p228），但从《蒋维乔日记》及《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出版信息来看，参与该书校订的只有长尾楨太郎和小谷重二人。

而与之相对的，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者们对近代教科书的编写方法不甚了解的状况。这一点可以从蒋维乔的日记里推测出来。

日记中记载，1903年5月，经蔡元培介绍，蒋维乔开始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国文教科书。同年11月25日，他完成了该书的编写，之后将书稿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但是在12月2日的日记中，蒋维乔写到：

张菊翁来述：蒙学读本，东西各国考定者皆以笔划繁简定浅深。已编之稿须将第一编重编。午后日本人小谷重、长尾榎太郎来。遂与张菊翁、高君梦丹¹¹会商体例。至五下钟议毕。

也就是说，蒋维乔由于没有按照近代教科书的编写原则编这套书，因此要把第一册重新编写。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编写失败，对近代教科书的编写方法深有心得的长尾和小谷才加入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的校订。

三、蒋维乔等人对日本教育经验的扬弃

那么，在蒋维乔等人通过日本顾问吸取日本教育经验之际，做出了怎样的取舍呢？从蒋维乔的日记来看，他们既有诚挚地接受顾问们的建议的时候，也有部分性接受建议，甚至直接否定顾问的建议的时候。

首先来看日记中关于他们接受日本顾问建议的记述。日记1903年12月4日记载：

东西各国教育家考定教科书首数册必取笔划极简单者，使儿童脑力不伤。惟西文有字母，东文亦有假名，故着手易。华文以音义相配，笔划甚繁。编辑时非常艰难。盖每一课既须意义贯串，生熟字相配，而又限于笔划也。午后小谷重、长尾二人来会商。

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蒋维乔在教科书重编之初，感觉到了教科书编写的新原则在应用到中文时的困难，但仍旧努力试图去适应。

不仅是汉字的笔划数方面，在插图、排版等方面他们也采纳了日本顾问们的建议。如下面两段日记：

午后小谷君来。述及教科书最重图画，彼国皆请第一等画手为之。颇嫌商务馆画手之拙，以为减杀文章品格。其言良是（1903年12月3日记载）。

读本为最难之事。既限笔划，又限字数，而布置图画不可呆板，变化不穷。且必每行到底，适可断句。不能将一句截断入别行。又必使一课文字与图画共在全幅之内。此皆第一、二编之例也（1904年1月28日记载）。

《最新国文教科书》的英文名是 *Chinese National Readers, with Illustrations*，可见插画是其一大卖点。也就是说，听取了小谷的建议而对书中插画做的改进，关系到

¹¹此处为蒋维乔笔误，实为梦旦，及高凤谦的字。

了整个教科书质量的提升。

但是，对于日本的教科书编写经验，蒋维乔他们也并不是全盘接受。1904年1月28日，蒋维乔等人完成了《最新教科书》第二册的编写。之后的日记中，便逐渐出现了他们对顾问们的建议的批判性听取。1904年2月13日的日记记载：

长尾君来辩论，教科书须每课次序互相联络，以便儿童记忆。余等与之讨论多时，决定相发明相印证，为精神上之联络，不可为形式上之联络。

可见，对于长尾的建议，蒋维乔等人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进行了具体化。

不仅是蒋等人对日本的教科书编写经验进行自主思考，在蒋维乔的日记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顾问长尾在向中国介绍日本教科书的编写经验时也是经过一番扬弃的。如1904年4月11日的日记。

编第二册教授法。长尾来，谈及名、动等词惟中学校讲文法始用之，小学不宜用。余以日本小学教授书中亦有此等名目质之。伊答言，日本教授书求形式上之动目铺排，此等文法，实为缺点。著者往往蹈此弊，不可从。余甚韪其言。

这是一段关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教授书（即今日的教学参考书）《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的编写的一段记述。长尾对日本教授书的批判及蒋维乔对其批判的肯定，反映了两人在引进日本教授法时的自主意识。

反映了蒋维乔等人自主意识的，还有《最新国文教科书》中所使用的汉字的选用方法。见于1904年4月2日的日记记载。

高梦翁建议，以读本第三册文字渐长，难于尽善，须多选古书删削入文。且每册零星出版，去取之途太窄。今拟全部文字选定后再以浅深次序配入各册，庶文字可期完美，去取得当。故现在专事选择古书。余检阅《韩非子》随阅随选，以为编辑之预备。

由这段日记可知，教科书中使用的文字是从《韩非子》等古书中选取出来的。也就是说，《最新国文教科书》所教的，是文言文。当然，这也是当时绝大部分教科书的共通点。然而反观日本，自从1900年国语科设立，其课程标准就规定教科书的文体由“可为普通国文之模范者”（「普通ノ国文ノ模範タルベキモノ」）转变成了“平易国语之模范”（「平易ニシテ国語ノ模範」）者，换言之，由原来的文章体变成了口语体。那么，为什么这一点没有被《最新国文教科书》采用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口语体语言，因此若要使用口语体编写教科书，便无法在全国通行；二是因为在当时，文言文才被认为是学问中应该使用的文体。在这种状况下，蒋维乔等人在编教科书时选择了使用与日本相反的文体——文言文。

另外，日记中还出现了蒋维乔等人对日本顾问的建议直接提出反对的记述。1904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

日本修身教科文字大半与国文教科书重复，而教员之演讲有别。盖修身专主训诫也。惟我国文与他国异。若修身文字亦与国文复，则大不妥。今长尾编修身亦缘此例，梦旦颇不以为然。余亦同意。梦旦之意欲采集经文中一二语合于今日社会者为纲，而演述其意，以编修身书。昨日与长尾谈论，而长尾力持修身不妨与国文重复之说。辩论良久尚未解决。

这里所说的“我国文”与他国的不同由于蒋维乔没有具体说明，因此也无法推测其具体所指。但这段日记反映了蒋维乔等人在吸取日本经验的之际注意考虑本国的文字文化和语言文化的精神。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蒋维乔日记》中蒋维乔等人对日本教科书编写经验的吸取过程，考察了清末国内知识分子在引进国外教育时的自主意识。蒋维乔等人在编写国文科教科书之初，由于不懂近代教科书的编写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长尾等日本顾问带来的日本教科书的编写方法，然而随着蒋维乔等人编写经验的逐渐积累，他们开始考虑本国的教育实情与独特的语言文化，对日本的教科书编写经验也逐渐转变为批判性扬弃的态度。《最新国文教科书》能在出版后的十几年一直在教育界独占鳌头，与编辑者们的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

近年，由于教育全球化的影响，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向国外学习的热潮。在思考对国外教育的引进时，我们和先人们一样，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即对国外的教育经验，应该怎样进行取舍。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实践，逐渐找到将国外先进经验和本国教育完美融合的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不妨以史为鉴，从先人们的做法中汲取一些经验。

参考文献

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出版周刊》新 156 号 1935。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中华书局北京 2014。

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清末小说》第 28 期 1992。

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初编》中华书局 北京 1957。

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書院 東京 1998。

增渊恒吉編『国語教育史資料 第 5 卷 教育課程史』東京法令出版 1981。